







湖湘文化大辞典

上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

# 《湖湘文化大辞典》编辑委员会

主任

刘正

副主任

禹舜 万里 罗可大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兴国 石峻 宁可 尹世杰 邓潭洲 朱森林 刘大年 刘晴波 吴立民

沧南 林增平 周谷城 张舜徽 胡光凡 钟叔和 侯良 陶懋炳 彭燕郊

主编

万里

常务副主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晓天 午苗 刘范弟 洪期钧

副主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吕锡琛 孙湘源 刘甲柱 陈良文 聂乐和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里 万伟珊 王晓天 王敏华 文建军 午苗 卢汉桥 成晓军 吕锡琛

刘正 刘甲柱 刘光宇 刘刚强 刘范一 刘范弟 刘高举 关雄 孙湘源

李日翔 李跃龙 李海兵 杨鹏程 何立强 陈昉 陈健 陈良文 陈靖华

张以文 郑洁 禹舜 周克臣 周静 周森 洪期钧 姜国洲 姚洪波

侯力 贺福安 聂乐和 高延湘 袁铁坚 郭汉民 黄勇 黄盛华 夏剑钦

各分篇主编及撰稿人:

前言

万里 刘范弟

地理分篇

主编: 王晓天 叶飞

撰稿: 叶飞 王晓天 午苗 钟铁强 崔湘伟 易立峰 杨宁

民族分篇

主编: 张世珊

撰稿: 张世珊 刘范弟



### 哲学分篇

主编：王兴国

撰稿：王兴国 卢本立 吕锡琛 朱汉民 李业远 张国华 张铁夫 陈锐  
贺福安 徐孙铭 龚抗云

### 宗教分篇

主编：吕锡琛 梁志高 徐孙铭

撰稿：吕锡琛 梁志高 徐孙铭 万里 释戒圆 陈旻 梁湘山

### 历史分篇

主编：万里 刘范弟 聂乐和 宋裴夫 郭汉民

撰稿：万里 刘范弟 郭汉民 成晓军 萧栋梁 吕芳文 黄启昌 方早成  
刘云波 陈珠培 刘恩达 陈先初 林志红 文建军 朱益民 李跃农  
杨玉兴 聂资鲁 赵立彬 张钦 邹小站 左双文 谭属春 向祥海  
刘渝龙 宋素琴 刘建平 周启云

### 考古分篇

主编：何介钧

撰稿：何介钧 午苗 侯良 柴焕波 张一兵 吴顺东 李鄂权

### 军事分篇

主编：王晓天 郑必华

撰稿：王晓天 郑必华 聂乐和 蓝奇光 崔湘伟 江新建 易立峰

### 教育分篇

主编：丁平一

撰稿：丁平一 邓洪波 黄其超 陈海波 刘范弟 万伟珊 高峰煜 朱汉民  
刘范美 陈谷嘉 萧百灵

### 语言文字分篇

主编：夏剑钦 鲍厚星

撰稿：夏剑钦 鲍厚星 万伟珊 蒋骥骋 谢伯端 郭晋稀 崔振华 刘精盛  
沈若云 龙富国 赵振兴 叶桂柳 郑宪章 廖承良 田辉 曾少达  
李亭玉 应雨田 伏俊连 毛秉生 张胜男 董正谊 夏光弘

### 文学分篇

主编：陈吾南 陈书良 华济时

撰稿：陈吾南 陈书良 华济时 胡光凡 王敏华 万伟珊 王浩 周柳燕  
陈绍方 胡英 华晔赟 易惠霞 周斌 孟泽 喻名乐 杨锦琴

### 艺术分篇

主编：陈吾南 尹伯康

撰稿：陈吾南 尹伯康 钟南阳 王文勇 赵洪滔 陈绍方 杨锦琴 贾玲  
刘镇钰 叶小穗 欧阳好龄 刘回春 午苗 胡光凡 范正明 陈青霓  
张九 谭君实 一凡 陈湘源 邓兴器 田灿 李怀荪 陈兴仪  
刘希伯 李楚池 娄慧珍 唐璧光 何钦德 胡健国

#### 民间工艺美术分篇

主编：万里  
撰稿：万里 万伟珊

#### 新闻出版分篇

主编：谌震 孙湘源  
撰稿：谌震 孙湘源 杨新正 万伟珊 李海兵

#### 电广传媒分篇

主编：孙湘源 高延湘 冯资荣  
撰稿：孙湘源 高延湘 冯资荣 万伟珊 王辛丁 余以均

#### 社会科学分篇

主编：卢本立  
撰稿：卢本立 刘涛 刘范一 周森

#### 特产分篇

主编：万里  
撰稿：万里 黄勇

#### 饮食分篇

主编：万里  
撰稿：万里 马晓伟 黄勇

#### 民俗分篇

主编：陈旸 万里  
撰稿：陈旸 万里 薛嵬 万伟珊 杨鹏 顾成德 刘子英 唐解国  
贾国辉 萧园 刘霁云 刘解玉 蒋丙莲 贺兰莉 杜平 王一兵  
王爱华 欧阳鼎 龙燕怡 刘黎光 胡晓春

#### 掌故分篇

主编：陈旸  
撰稿：陈旸

#### 建筑分篇

主编：周静 杨慎初 谢光华  
撰稿：周静 谢光华 朱益民 陈忻 周孝思 杨瑛 周森 马晓伟

王超英 汤 伟 竺钦军  
文化设施分篇

主编：陈义 周德辉 郭润葵

撰稿：陈义 周德辉 郭润葵 孙 渊 邹接龙 侯良 陈树立 嵇镇南 言海存

旅游文化分篇

主编：午 苗 侯 良

撰稿：午 苗 侯 良 张长虹 陈启贵

医药卫生分篇

主编：袁 煦 万 里

撰稿：袁 煦 万 里 陈 健 丁忠普 王钟吾 龙俊杰 刘炳富 袁洞君

黄强刚 姜国洲 张援朝 陈 旻 袁鸣钢

体育分篇

主编：罗露玉 罗兴国 杨文义

撰稿：罗露玉 罗兴国 杨文义 丁非杰 何小玲 易芷媛

附 录

主编：万 里 午 苗

撰稿：万 里 午 苗 刘范弟 万伟珊 孙湘源 侯 良 张长虹

# 《湖湘文化大辞典》工作委员会

顾问：刘正 潘贵玉 蒋建国 周时昌 许云昭 罗桂求 文选德  
游碧竹

主任：庞道沐

副主任：丁来文 姜儒振 王秋沙 郭树人 刘鸣泰 袁新华 何报翔  
谭谈 罗成琰 朱有志 孔介夫 王新国 刘之明 贺德欣  
雷鸣强 余景涛 于云彩 罗志宏 杨光荣 何满宗 文树勋  
黎勇 汤定一 罗可大

办公室主任：罗可大（兼）

办公室副主任：（按姓氏笔画排列）：

毛朝辉 叶心予 刘永忠 李日翔 李冬山 李建国  
吴志勇 姜蝶辉 崔富山 谢瑞其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里 万惠民 马柱 马建国 孔立如 孔国清 孔胜国  
尹小英 尹海林 文健 文建萍 毛旭平 王勇 王丹成  
王元益 王功长 王立军 王立新 王伏明 王兴国 王益枝  
王铸铭 王新民 邓建雄 史雪华 左连生 田际榕 申怡  
申春莲 龙炜 龙征兵 任正斌 任福军 刘平 刘余  
刘佳 刘建 刘清 刘干武 刘云波 刘孝听 刘志强  
刘沛云 刘建平 刘建龙 刘范弟 刘秋良 刘晓龙 刘继雄  
刘新平 刘新民 刘瑞 刘德华 刘默然 向丽梅 吕建明  
吕品龙 朱汉民 朱玉国 朱国旗 朱忠良 朱剑斌 邬立平  
阳盛海 何龙彪 余克俭 余佳祥 吴大友 吴国清 吴静文  
宋伟奇 宋晋武 张杰 张洁 张斌 张小亮 张可征  
张电波 张先平 张再平 张再明 张庆红 张行力 张利民  
张应钦 张志诚 张志勇 张迎春 张建辉 张美香 张铁云  
张湘鸿 张献忠 张燕平 李刚 李征 李娜 李翔  
李世安 李伯成 李宗戈 李建国 李松龄 李林根 李树华



《典籍大业文脉》

李洪波	李荣军	李宽全	李盛书	李程辉	李靛熹	李楚屏
李德胜	杜宏亮	杨刚	杨娜	杨幼奇	杨晓瑜	杨喜平
肖小玉	肖小敏	肖发科	肖仲国	肖建华	肖树森	肖策英
肖意成	苏和平	邱敦红	邹志贤	闵文	陆乐耕	陈小文
陈广能	陈自力	陈宏忠	陈建国	陈晓红	陈跃文	陈智慧
周光军	周安伟	周克臣	周建国	周柏良	周秋光	周海林
周湘兵	周辉成	周锦程	易健	易美奇	林阳生	林春光
欧小琴	罗伟	罗碧野	范遵新	郑晴	郑旗	姚志均
柳思维	胡子俊	胡文波	胡旭晟	胡志国	胡孟东	赵会华
钟军	钟正太	钟阿丽	项建平	饶志明	饶纳新	饶景辉
唐云华	唐荣忠	夏声朝	徐小和	徐孙铭	徐汝良	徐运宽
徐敏芝	涂日明	聂厚忠	莫道宏	袁兵	袁灿	郭浩
郭建明	高明	常亿明	常利民	常格亮	曹年存	曹志红
曹艳萍	梁肇洪	章庭杰	黄梁	黄旭东	黄建华	黄忠强
龚景顺	龚蜀雄	傅岗山	彭瑾	彭大成	彭长林	彭军良
彭欢首	彭克让	彭克勤	彭泽仁	彭俊锋	彭勇	彭思华
彭海华	斯洪标	曾小娟	曾利满	温小寒	游碧景	童卫星
童菊成	舒和平	蒋勇文	覃道瑞	谢志宏	赖坤明	廖岚
熊席成	谭正炎	谭超纲	潘如一	戴佐才		

著作权单位：湖南省湖湘文化产业促进会

湖南开源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湖湘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文籍吴	雷国吴	丈太吴	并卦余	益克余	澳狄回	磷盛用
孟可派	亮小派	斌派	帝派	杰派	苑晋宋	俞甫宋
另味派	代百派	珍丸派	即再派	平再派	平求派	越申派
云对派	香美派	孰鼓派	春以派	夷志派	蔚志派	对血派
顾李	聊李	翁李	幽李	平燕派	忠楠派	甄雁派
单树李	琳林李	翎封李	因数李	父宗李	如印李	交世李

## 序

刘正

卷帙浩博的《湖湘文化大辞典》即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辞典是由一批湖湘学人历时十六载披沥编纂而成，是对深入研究开发湖湘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

湖湘文化源于湖湘百姓大众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是历代先进知识分子对湖湘各民族求生存求发展丰富经验的积淀升华，是用来开拓未来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需要的智慧结晶，是在自身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兼容其他地区文化精华逐步形成的具有鲜明湖湘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据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在史前时期，湖湘地区就有古人类活动；在夏商周期间，就有湖湘文化的萌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湖湘文化则在学术自由和百家争鸣的盛况中获得初步发展，并与其他区域性文化相互濡沫，竞相呈妍。被后人尊为湖湘文化先驱的屈原和贾谊，就通过《楚辞》和《过秦论》等文学艺术与政论经典，以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和奔放浪漫的豪迈风格，深刻影响着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

唐宋以后，我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湖湘人杰地灵，学者云集，大儒迭起，经济、文化日益繁荣。宋代对湖湘学术思想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学者周敦颐，以其《太极图说》与《通书》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继而胡安国父子讲学南岳并主持湘潭碧泉书院，创立了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张栻，曾先后主持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并与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朱熹举行学术会讲和辩论，时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盛况空前，更留下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千古美誉。从此，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学子就以心怀天下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研讨学术，评议时事，陶铸士气民情，影响社会风尚，凸现出湖湘文化的深厚感召力和凝聚力。明清之际，王夫之又以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和学术鸿篇，把湖湘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推向新的高度。到了晚清，作为放眼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在推介世界舆地和各国历史政制、风土人情的《海国图志》中，更提出了一整套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中心的救国方略，使众多国人特别是有识志士从闭关锁国的睡梦中警醒，成为嗣后发动洋务运动的划时代号角。六十卷本的《海国图志》还曾传入日本，几年之内，翻印和翻译

的刻本就达 22 种（一说 21 种）之多，在朝野上下广为传播，对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时，在湖南先后涌现的陶澍、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等改良务实人才群体，在近现代涌现的黄兴、蔡锷、宋教仁、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等革命领袖群体，还有历代涌现的张仲景、魏华存、怀让、怀素、辛弃疾、李东阳、齐白石、杜心武、田汉、沈从文、贺绿汀、丁玲等各界文化名人和志士豪杰群体，他们的成长，都与接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分不开，并对其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湖湘文化不仅造就了湖湘地区的人才与事业，还造就了影响和推动整个中华民族开拓前进的人才与事业；不仅过去是这样，今后还将如此。这就要求我们更好地研究开发以忧国忧民、经世致用和敢为天下先精神为主要特征的湖湘文化，为现实服务，为构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这是大有可为的宏伟事业，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糟粕，诸如自我陶醉的排外思想，同室操戈的乡党作风，对专制主义统治的愚忠，对八股试士取士奴化教育的盲从等，在近现代史中均可见到，也给后人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是需要通过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认真加以清除的。

现在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着无数需要研究解决的新课题。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弘扬学术自由和百家争鸣的优良学风，既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又深入研究开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抒发人民智慧，振奋民族精神，不断完善改革开放的体制、政策和举措，更好地开拓前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盛世修典不仅在于述备前人功绩，更在于总结前人经验，传承前人成果，汲取前人教训，发展前人灼见，以为后世范。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百花园中一丛绚丽多姿的奇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湖湘文化大辞典》的编纂出版，虽不能说已经完美无缺，但确实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和开发湖湘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丰富内涵的工具书，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

我还认为传承文明乃积德善举，湖南开源置业有限公司为这部辞典的出版提供了经费，今后还将支持湖湘文化产业促进会开展活动，以加强文化建设促产业发展，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提倡的。

是为序。

2005 年 9 月 1 日于长沙



# 前 言

地域文化研究是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更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湖南学者关注得较多的是湖湘文化。但究竟什么是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究竟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还是一种思想文化或者文化精神的概念？湖湘文化的源头究竟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湖湘文化究竟包含有的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湖湘文化的内涵及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对湖湘文化的正确了解和深入研究。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确定湖湘文化的内涵、定义、构成要素及其历史源流发展状况，然后才能据此认识湖湘文化的个性特征以及在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才能对湖湘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扬弃，以促进湖南社会政治、经济和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

## 一、湖湘文化的内涵及定义

我们认为：湖湘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是历代（包括现实）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造的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的总和。

一般而言，一种文化系统的“独立存在”是否能够成立，关键在于能否获得某个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在乡土观念和认祖情怀非常强烈的中华民族，对某一特定地域文化的认同不能不体现在对乡土的文化认同上。由此看来，湖湘文化首先应该是一种地域乡土文化。

作为一个区域性文化系统，湖湘文化有着自身特定的内涵及外延。湖湘文化源远流长，蕴涵丰富，从广义来看，是自古以来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精神文化及物质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则是指自古以来湖南的原住民、各个时代的移民及流寓者所共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文化精神和积淀凝固而成的湖南人性格。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无论是对其进行界定或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内涵实际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湖湘文化应该是一个丰富的多层面的复合体，既包含了意识形态层面的观念文化、精神文化，也包含了物化形态的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既包含了上层社会的主流文化、庙堂文化和精英文化，也包含了世俗的大众文化、草根文化和江湖文化；既包含了最早生息于湖湘大地的原住民及后来陆续迁徙进来的“三苗”、“荆楚”等多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也包含了秦汉以降作为主流文化传入的汉民族文化及中原文化。其中既具有强烈稳固的原生态特质，又有着因应社会时代变迁之流动性、发展性、变异性等衍生特质。正是在这些多元文化因子的持续互动合力作用下，这一地域文化才日益丰富并逐渐定型而形成了特色独具的湖湘文化。只有从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视野、独具的学术视角和对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自觉运用的基础上，才能建构起一部较为客观真实的湖湘文化发生、发展与成立史，才能辨析和认识湖湘文化除了与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其他地域文化普遍共同的文化特质之外的自身精神特质和形态特色，才能进而体味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

## 二、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一）湖湘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 1. 史前时期湖湘地区的远古人类活动

据考古发掘资料证实，远在旧石器时代，湖南就早已有古人类活动。1987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新晃侗族自治县的江口、曹家溪、柏树林、新村、沙湾、长乐坪、十家坪、石鸟溪八处地方发现了旧石器

时代的遗址，时间约在距今5万~10万年前。<sup>①</sup>同年，又在怀化、辰溪、黔阳、澧县、石门、津市、临澧、桑植、安化、浏阳等市、县陆续发现旧石器地点30多处，时间分别距今大约为1万至20万年不等。这些遗址出土的旧石器大都发现于河流溪水之傍的一级或二级阶地上，所用石料均为采集于溪流中的砂岩、石英岩或石英质地的砾石。<sup>②</sup>发现的地址及石器的材质等都表明，远古人类一般都选择在靠近水源的地方居住，这便于多种食物的采集。

距今1万年前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至今，湖南已经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1000多处，分布的地域遍布湖南全省各地，时间距今为9000年前至7000年前不等。由于各地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及受周围地区不同文化系统的影响，这些新石器的内涵和风格又各具特点，发展并不平衡。大致可以分为四大区域，即：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区，湘江、资江中游和湘中区，沅水中上游和湘西区，湘东、湘南区。其中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区的新石器遗址发掘得最多，发展的序列也最为清楚，故考古学界将这一区域的新石器文化分为皂市下层文化（或称“前大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四大发展阶段。资江中游和湘中区、沅水中上游和湘西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与此大致相近。比较典型的遗址有：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澧县八十垱遗址、石门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址等。在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器、陶器和竹、木、骨器，以及许多动物的残骸，上百种可以辨析的植物如莲、菱、桃等，以及距今时间超过8000年的大量稻谷、稻壳，还发现了建筑遗址、墓葬甚至原始的古城址。这些均表明，湖南的远古人类已经由单纯的采集渔猎经济进入到了与原始农业及原始养殖业并存的经济形态阶段；并且已经学会了建筑房屋、储备粮食、炊煮熟食，进入到定居的原始农耕社会阶段，甚至可能已经产生了氏族部落制度。<sup>③</sup>经1993年、1995年和2004年的多次考古发掘，在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原始古栽培稻，经北京大学C<sub>14</sub>实验室及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先后用质谱加速器测定，已经能够确定这些稻谷距今至少有1.2万年至1.4万年。<sup>④</sup>这一最新发现，不止是将湖南的新石器时代于距今9000年的基础上向前推移了3000~5000年，更为湖南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明之源提供了初步的实物证据。联系到被称为中国农业文明始祖的炎帝神农氏墓葬位于湖南酃县（今炎陵县），这一认定可能接近史实。

## 2. 夏商周时期湖湘文化的萌芽

这一时期湖湘地区的文化发展可以归纳为两条并行发展但不时交织在一起相互产生影响的主线：其一为承袭于远古的土著人类在湖湘大地继续创造和发展着本土文化，其二是中原文化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途径不断地对湖湘文化产生影响。

约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开始由原始氏族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这表明，中国的先民们已经进入了明确的社会文明阶段。在中原地区，由禹传位于其子启，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湖南地区古人类的社会历史进程与中原地区相比，大致同时或稍后。至今，在一些史籍及传说中，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几位著名的氏族部落首领，如尧、舜、禹，都与湖南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尤其是舜，更是死于湖南、葬于宁远县的九嶷山——这是传世唯一可靠的舜帝墓葬，不但载于史籍，还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地图上已经标明。2003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九嶷山玉琯岩发掘出了不晚于东汉

① 湖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编：《文物普查简报》第8期，1987年编印。

② 分别见袁家荣：《湖南旧石器文化遗存》，《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邓建强、向军：《安化县小淹及益阳县新市渡旧石器地点》，《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魏涛、李鄂权等：《长沙地区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1991年12月28日《长沙晚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漫步》，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8月版。全面情况综述可参见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漫步》，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8月版。全面情况综述可参见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④ 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此文是袁家荣先生1998年3月在日本东京“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载于《求索》2002年“湖南永州舜文化研究专号”。



早期的舜帝陵寝祭祀坑遗址,更早的遗址还在继续发掘之中。此外,湖南湘潭的韶山,相传也与舜帝有着联系,即谓舜南巡时,曾经奏韶乐于此,因而得名。<sup>①</sup>这表明,在夏王朝建立前后,华夏中原地区与荆楚地域之间已经有了文化的互动交流,从而带动湖南境内的氏族部落逐渐进入阶级社会。

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于中原建立。据《竹书纪年》等古籍记载,商王朝在征伐荆蛮的战争中,其军事及政治势力一度接近或进入湖南,这表明殷商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影响了湖湘大地。自1922年从桃源县漆家河发现美艳绝伦的“皿天全”青铜方彝后,至今,湖南各地出土了大量殷商时期的青铜器,所出土的青铜器,既与出土于中原地区的样式形制风格接近,又具有自身独特的地域特色,而且有些器物比中原所出土者样式更为精美、形制更为庞大。例如,1959年从湖南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同时出土了五件商代青铜大铙,其中最精美的一件象纹铜铙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也是湖南出土青铜大铙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1983年又在宁乡发现了一件通高103.5厘米、重221.5公斤的象纹青铜大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大的商代铜铙。后来又陆续出土铜铙近20件,比举世闻名的于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还要早1000余年。这些铜铙组合起来,至今还能奏出清脆悦耳的乐曲。宁乡出土的这些铜铙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如形体高大厚重,甬部有旋,纹饰繁复,有特殊的兽面纹,多为虎、象、鱼等动物图纹,需置于座上仰击。这与北方铙形体很小、甬部无旋、纹饰简单、可手执而击等特征相比有明显的差别,因而可推断这些大铙应该是本地铸造的。至今,在湖南已经出土了40余件大铙,居全国之首,超过100公斤的大铙有10件以上。此外,在宁乡县黄材炭河里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的“人面纹方鼎”为四方型、立耳、深腹、柱足,四面皆以人面孔为纹样,在现今可见的商周器物中尚属孤例;20世纪30年代在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造型独特,漆黑光亮,以4只立体山羊构成,整体纹饰繁复细腻,巧妙精致,有强烈的立体感,采用分铸法制造,为国内绝无仅有的珍品。<sup>②</sup>由此可见,湘中地区最迟在商代中期已进入成熟的青铜器时代。

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于中原建立。更多的古籍如《竹书纪年》、《诗(经)》等记载了周王朝征伐荆蛮的战争。相传周昭王曾经南巡来到位于湖南长沙与湘潭之间湘江上边的昭山,盘桓多日,后殁入山下深潭,故潭名“昭潭”,山名“昭山”。此外,各地出土了数量更多的周代陶器和青铜器,除了能够证实湖湘本土先民与周王朝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外,也表明湖南的本土文化有了更大发展。

关于湖南出土的大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来源,学术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认为这是来自于中原的商周器物,或认为是南下的商人后裔在湖南所铸造,或认为完全是湖湘土著人所铸造。1996年至1998年,在望城县高沙脊发掘了一处商末周初的遗址和墓地,地层中的文化堆积在时间上与湘江下游费家河类型的晚期紧相衔接,而且在文化面貌上没有缺环,但与地处中原的商周文化相去甚远,与地处更南的越文化更是大相径庭。一些学者认为,将其视之为湖湘本地土著民族的文化更为恰当,这个民族就是殷商人未进入湖南之前的湖湘本土史前文化的创造者苗蛮的一支,也许就是不断见诸史籍而又扑朔迷离的“三苗”。在这次经过科学发掘的墓葬中,有数座出土了青铜器,既有典型的商末青铜兵器戈与矛,也有礼器鼎与尊,这些应该属于受到殷商文化影响的作品;但是,另外有6件铜鼎和1件铜尊的形体很小,总体形态和纹饰类似商器,但有变异,个别因素与西周晚期以后越式鼎中的一种、即盘口鼎似有渊源和演变关系,这后一类器型,显然系本地铸造。由于这是一处既有遗址又有墓葬的地方,故铸造这些铜器的人群也应该是其使用者,亦即苗蛮的一支——三苗。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样为宁乡铜铙的制造者的族属找到了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答案。<sup>③</sup>

此外,湖南有着丰富的金、铜、锡等矿产资源,后两种矿产就是铸造青铜器的金属材料。更值得指出的是,青铜是一种以铜、锡为主要材料的合金,与中原所发现的同时期青铜器相比,湖南所发掘的商周青铜器中金属锡、铅的含量较多,还含有中原青铜器中非常少见的金属锑,而湖南正是中国锑金属的

① “韶”乃虞舜时乐名。《尚书·益稷》曰：“箫韶九成，引凤来仪。”

② 以上均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漫步》，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8月版。

③ 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漫步》，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8月版。

主要产区，也为这些青铜器为湖湘本地所铸造提供了有力的内证。由此可见，远在先秦时期，湖南的铸制造业已经非常发达。这也可以作为当时湖湘社会文化已经非常发达的佐证。如此多的祭祀礼器、乐器和饮食器具的出土，可以证明在商周时期，湖湘大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形态达到一定水平。

### 3. 春秋战国时期湖湘文化的初步发展

春秋战国，湖湘的社会经济文化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要对春秋战国时期湖湘地区文化的发展概貌及其属性特征有一个较为准确清晰的认识，首先必须了解这一时期湖湘地域内的民族构成情况。

据史籍记载及考古材料证实，在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更早以前，湖湘大地主要居住着五个古老的民族或部族群，即越人、蛮人、濮人、巴人和楚人。其中前三者最为古老，可以称之为湖湘大地的“原住民”，后两者进入湖湘地区的时间相对较晚。

古越人是湖湘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广泛分布于除湘西之外的湘东北、湘东、湘中和湘南地区，即湘江流域和资水中下游地区。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楚人进入湖湘以后，居住在湘北和湘中地区的越人群体南迁，集中徙居于湘南地区，即湘江中上游流域。直到秦汉时期，越人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主要住民。此后，部分向西南和南方迁徙，部分仍然留在湘南，成为现今湖湘侗族的先民。

蛮人也是湖湘地区最古老的民族或部族群，一般认为是殷商至西周时期的“荆蛮”，即远古时期曾经与炎、黄两大部族集团逐鹿中原的苗蛮——“三苗”的后裔，广泛分布于长江中游和湘北的洞庭湖沿岸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在兴起的楚人的不断征伐挤压下，部分被融合进楚民族，部分则从滨湖平原溯沅水、澧水向湘西和湘西南迁徙，仍然保留着自身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独立性，成为现今湖湘苗、瑶民族的先民。

濮人也是湖湘大地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是当时散居在汉水流域及其以南一带如湘西北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方国部落群。顾颉刚在《史林杂识·牧誓八国》中认为，濮人的活动地区广阔，东起荆楚，西至四川、云南、贵州，南及湖湘一带。据《尚书·牧誓》记载，濮人（“百濮”）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部落群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聚居在湘西的濮人后来成为秦汉时期史籍中所记载的“武陵蛮”和“五溪蛮”的主要民族构成部分，与前述“蛮人”一道，成为现今湘西和湘西南苗、瑶等少数民族的族源之一。

相对于中原各民族而言，在当时，以上三个民族或部落群的社会经济生产力发展较为落后，故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国家。这就是《左传·文公十六年》孔《疏》引杜氏《释例》所说的：“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前述所谓“苗蛮——三苗”的民族社会发展状况亦是如此。正是如此，史籍对其记载较为散乱，有时还相互交错混淆在一起。在先秦古籍中，对居住在南方包括湖湘的各民族统称为“南蛮”，这是一个庞大的民族系统，内部民族关系比较复杂。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四裔》中将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族，其中的卢戎即蛮族之一，因而顾氏认为“南蛮”实际上是指蛮、濮、巴三个民族或部落群。有些学者如顾铁符在《楚国民族述略》中认为，我国古代的所谓“三苗”，指的就是这三个民族——这些民族或部落群中的某些部分，便是历史上乃至现今仍然生活在湖湘大地的各少数民族。无论怎样，他们是在湖湘大地居住最久、人数最众、文化最为丰富、历史沉淀物最深、对湖湘文化的原创贡献最大的土著民族，则是无疑的。这三个湖湘远古原住民族或部落群的存在、活动情况以及文化特征，不止是有着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还得到大量考古发掘材料的证实。他们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就已经进入到青铜器文明的时代表之中。<sup>①</sup>巴人相传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为廪君巴务相的后裔，也曾经参加周王伐纣灭商的战争，周初受封建立巴子国，其领地大致为鄂西和川东一带。战国时期，在势力兴起的楚国的逼压下，逐步向川东退缩。春秋时期，与巴人发源地鄂西相邻的湘西北地区已经有了巴人的活动。战国中后期（前316），巴国被秦国所灭，川东失国的巴国遗民大批流徙进入湖湘，散居于湘西北和湘西的蛮人、濮人居住地区。这一民族，也成为秦汉时期的“武陵蛮”和“五溪

① 前文已经介绍了湖南各地所发掘的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许多就是这些湖湘原住民族所铸造。关于这些原住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考古发掘的材料甚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例。

蛮”构成部分，并成为现今湘西土家族的族源。

楚人是进入湖湘大地较晚的一个民族。与湖南古代民族历史有关的楚人，应该包括两部分人，其一即前述自夏、商时代一直居住在洞庭湖区的湖湘土著民族“荆蛮”而后被融合进楚民族的一部分；其二为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征服者不断从长江以北楚国腹地南下湖湘的楚人。这一部分楚人包括有楚国的王族和贵族、派遣的地方行政官员、南征的士兵、部分移民和商人及其家属等，还包括部分被楚灭国和同化后被强制南迁的江北方国居民。春秋以前，楚人主要分布在湘中、湘西北和湘东北地区；自吴起相楚征湘后，逐渐分布到湖湘各个地区，其中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较为集中，其他则分布于长沙、益阳、常德、临澧至湖北江陵的交通线上；在湘南和湘西南地区，楚人仅仅作为统治者和征服者，为数甚少<sup>①</sup>。

以上所述巴人和楚人进入湖湘的时间均较晚，且巴人仅仅分布并散居于湘西北和湘西，楚人则主要分布在部分中心城镇和交通线上，而且无论是绝对人数还是相对人数都较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被包围在其他湖湘原住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故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湖湘文化，肯定难以将楚文化作为湖湘地域文化构成的主体。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822年，楚国的国君熊霜去世，他的三个弟弟争位，最后的结果是仲雪死，叔堪（叔熊）逃亡避难於濮，少弟季洵立为君主。据《国语·郑语》记载，楚国的一些贵族准备支持叔堪（叔熊）立为国君，因为祸难而没有成功，最后，叔堪只得留在濮地而被濮人蛮化了，没有再回到楚国。由此可见，在商朝乃至西周时期，活动于湖湘大地的包括“濮”在内的“三苗”作为一个庞大的方国部落群，尚未归顺于楚国成为其版图内的属民，反而还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得以保护楚国的王族流亡者，并具有吸引他人归化的文化同化力。

东周时期，楚国日益强大。公元前758年，楚国蚡冒即国君位，随后便开始了对濮族的征战，以开启疆土。公元前704年，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后，即对濮族大举进攻，并占有其地。经过这次打击，汉水流域的一部分濮人与楚人融合，其余的则纷纷逃亡迁徙，楚国的军事政治势力开始占有汉水流域并从西路进入湖南的湘西地区。公元前689年以后，楚文王即位。《汉书·地理志》“罗”应劭注：“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汉代的罗县，即今之岳阳汨罗，故城在今汨罗市西北。表明此时楚国已经从南路进入湖南，并建立了战略据点罗子国城。此后，史籍中虽然记载着楚国不断地向周边征战并扩大版图，但在这一时期，楚国究竟是否进入了湖南内地以及进入了多深的地域，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直到春秋时期的中叶，湘东南、湘中地区，即湘江流域，仍然生活着以印纹硬陶为考古文化特征的古越民族。多年来，在湖南的境内发现了不少属于春秋时期的楚文化墓葬和遗存，但几乎全都分布于湘、资、沅、澧四水的交通要道上。

一般认为，楚国大致是在西周末东周初开始将其势力深入到湖南，并将湖南的大部分地区纳入楚国的版图。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清代学者顾栋高认为“春秋时楚地不到湖南”。不论怎样，作为与楚国紧密相邻的地区，湖湘文化受到楚文化的一定影响，应该是没有疑义的。而且，这种影响，更加促进了湖湘本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战国时期，楚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断加强对江南地区的开发。据《后汉书·南蛮传》载：约公元前385年，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前381）担任楚悼王的相后，“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可见，直到此时，楚国的势力才真正伸入到湖湘的腹地，并置黔中郡进行着统治。而此时距楚国被秦国灭亡的前223年，只有160余年的时间。然而，楚国的黔中郡存在的时间仅仅只有百余年，因而楚国对湖湘部分地域的实际控制和直接的文化影响，为时并不是很长。

#### 4. 秦汉至隋唐时期湖湘文化的继续发展

秦王朝建立后，施行了有利于封建集权专制的郡县制，广修驰道，统一了币制和度量衡，湖湘地区也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逐渐与中原地区融为一体，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秦王朝统治的时间虽然短暂，但版图的统一，促进了各个地区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为湖湘

<sup>①</sup> 这里关于湖湘古代民族构成情况的介绍，部分内容参考了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地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时期，湖湘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主要促进因素，是在全国统一的背景下，北方、中原及各个地域的大量移民涌入湖湘，并带来了他们各自包括生产技术在内的各种文化。整个秦汉时期，全国的户口数及人口数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再到低的消长起伏状况，而湖湘地区则呈现一种大幅度、稳定性的增长趋势。这是由于中原地区兵祸天灾接连不断，当战乱较少、年成较好之时，人口呈增长趋势，反之则减少。因而每当中原兵祸天灾频繁发生时期，北方和中原地区的人口便大规模地向南迁徙，其中包括人们自发地迁徙以及政府有组织的移民。据史载，西汉元始元年（公元2年），湖湘人口数为71万多，到东汉永和五年（140）时便增长到281万多，一百余年的时间，人口增殖将近三倍。所增殖的人口数中，既包括本地人口的自然增殖，也包括大量外地的移民。随着大量移民的进入，湖湘地区人口的民族成分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动。境内原有的大部分土著民族逐步向西部、西南部以至湖南境外的西南山区退徙，而外地移民则占据了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主要是湘北平原及湘中丘陵间的盆地。迁入的主要是中原人和原来楚地的住民，他们与那些还留在湖湘各地的土著住民融合，逐渐形成了湖湘境内新的主体民族——汉族。这一时期，作为广义荆楚地域文化产物的道家思想文化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形成了有别于先秦道家的“黄（帝）老（子）道”，被学术界称之为“秦汉新道家”。黄老道甚至成为了西汉王朝官方的治国指导思想。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文（帝）景（帝）之治”，与施行道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思想是分不开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就有关于黄老道的著作。湖湘又被称之为“屈贾伤心之地”，西汉著名的思想家贾谊，也一度因被贬谪来到湖湘担任长沙王太傅，留下了一些与湖湘有关的杰出篇章。他与先秦时期流寓并悲壮殉身于湖湘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一道，成为了湖湘人的骄傲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文化资源。

三国时期，湖湘地区成为了吴、蜀军阀争夺的战场。至魏晋六朝时期，也遭受过多次战祸兵燹，出现过“湘土荒残”的状况。这不能不对湖湘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相对于中原而言，湖湘地区社会仍然较为稳定，故北方及中原的移民继续不断迁入，湖湘的社会经济虽然缓慢但仍在持续发展。这一时期，形成并流行于北方及中原地区的道教，以及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也陆续传入了湖湘，在交流融汇中给湖湘文化带来了新的文化基因，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发展；当然她们在湖湘文化的孕育下，也获得了新的生机进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甚至引领着中国道教、佛教的发展潮流。例如，著名道教人物魏华存在南岳修道16年，传播上清经录，促进了中国道教上清派的产生并成为道教上清派的宗师；以佛教“南岳怀让系”为主体所形成的“江湖禅宗网络”，更是对全国乃至海外的佛教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隋唐五代，随着国家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湖湘地区也与全国保持着同样的发展态势。湖南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重要政治战略意义的行政地域概念及人文地理概念，此时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开始形成。这种印象的形成，当然是与湖湘地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的客观存在分不开的。这一时期，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因各种不同的原因来到湖湘地区，进一步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如果说在先秦时期湖湘文化是以地域民族文化凸现自身特色，那么在这一时期，湖湘文化则开始以地域思想文化特色而崭露头角了。

##### 5. 宋元明清至近现代时期湖湘文化的蓬勃发展

宋王朝在公元960年建立后不久，即逐步消灭了南方包括湖南“马楚”在内的地方割据政权，并着力经营南方。例如，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朝廷派蔡煜、章惇对湘中的梅山地区进行开发，新置了新化、安化两县，史称“开梅山”。南宋时期，北方的广大疆域沦入金人之手，湖南更是成为了南宋王朝所倚赖的重要地区。例如，著名的爱国主义将领、词章大家辛弃疾在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期间，于长沙建立了练兵基地，创建了一支当时最精锐的地方部队——飞虎军；飞虎军的营垒故地就是长沙妇孺皆知的地名“营盘街”。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湖南的手工业、商业及交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宦宦、学者都来过湖湘，并为湖南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局面的出现，无疑促进了湖南社会经济文化的飞跃发展，为湖湘文化的崛起奠定了扎实的基